



珍藏版

叁

山東畫報出版社

老照片

13 辑

从院士到学部委员 谢泳

胡适与蒋介石 徐宗懋

1959年：夏日的旅程

20世纪初的长江流域

鲁迅先生出殡的照片

50年前的金圆券风暴

追忆金门之战

丛乐天

罗点点

史建

吴小佩

启凤

老照片



晚年的胡适（摄于1961年）

山东画报出版社

·书末感言·

新世纪之《老照片》

汪稼明

新世纪到来，呈一时之盛的怀旧之风，日渐式微。然《老照片》还在办下去，且办得有兴致。原因有二。

其一，《老照片》之旨，原不仅是“怀旧”，更是“更新”。在来稿中，我们常发现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全新揭示，乃至揭秘。历史中所藏的未知，正如未来世界之谜，是永无穷尽的。而且，对历史的新发现，由于已是事实，已有定论，故而更能惊人心魄，常令人感慨万分。即如本辑中《追忆金门之战》一稿，将1949年10月人民解放军跨海进攻金门岛，因轻敌躁进，致使9000官兵和船工阵亡、被俘的真实情状披露出来，尤其是少数被俘到台湾，后辗转回到大陆，又遭不公正对待的官兵，其经历令人欷歔。固然，在历史面前，个人生命是渺小的，为了抗击日寇，为了解放全中国，我们战死了何止9万、90万、900万战士，然而……我想，有时候，历史的思考比思考未来更为重要。

其二，“怀旧”是人类最基本的情感之一，它既不因世纪末而存在，也不因新世纪而消逝。不过，同是怀旧，内容却大不相同。有人喜欢回忆风花雪月，有人留恋纸醉金迷……此类种种，不客气地说，《老照片》不屑一怀。我们注目的，乃是人之命运，社会之变迁，是这一切之中的文化内涵。

在新世纪里，我们将照以上两条尽力做下去，其实，这也是我们的初衷，并无丝毫新见。也想到，这些做法，恐怕不合潮流。好在《老照片》的读者自有识见，或来函来电指正，不亦可乎。

书 名：老照片（第13辑）

出版发行：山东画报出版社

（地址：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：250001）

印 刷：山东人民印刷厂

（厂址：泰安市灵山大街东首 邮编：271000）

版 次：2000年3月第1版 2000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：1—20000

规 格：32开（850×1168毫米）5印张 115幅照片 90千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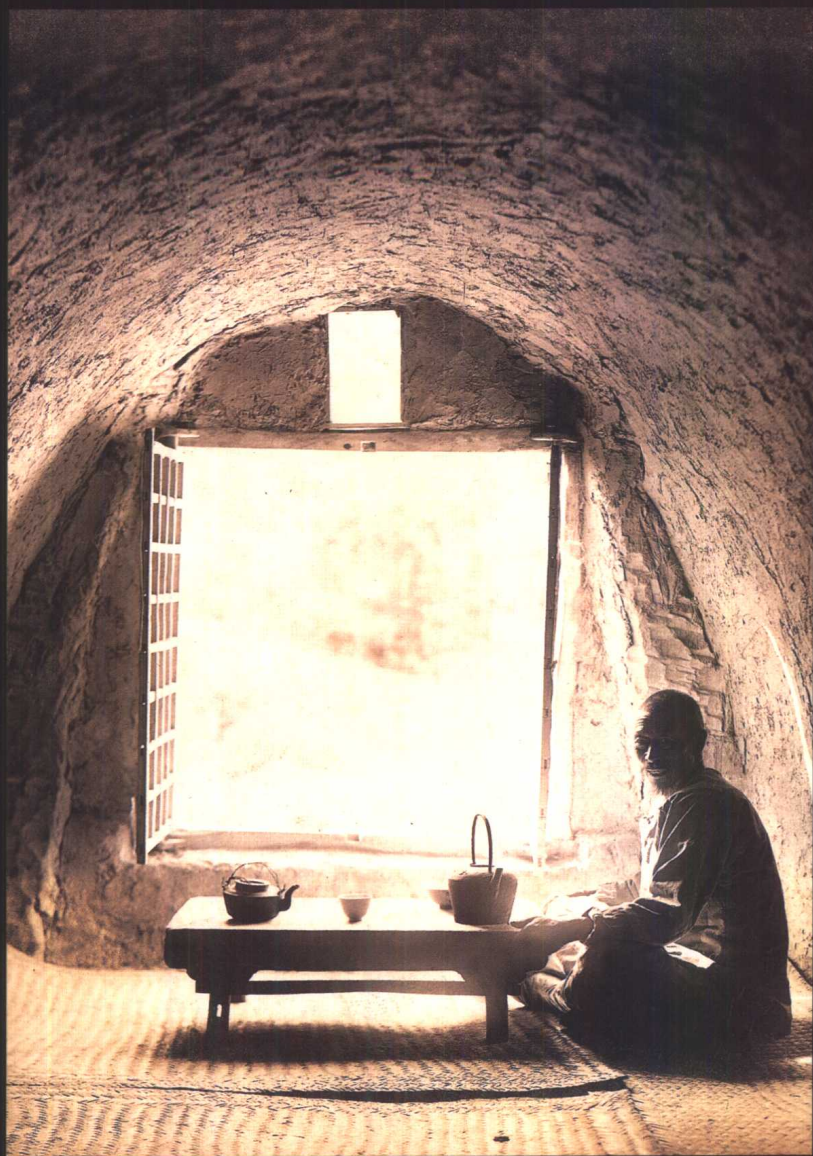
I S B N 7-80603-445-5/K·107

定 价：8.5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

19世纪香港佳丽（照片说明见本辑74页） 金伯宏 供稿



窑洞里的冥想

摄于 20 世纪 20 年代

照片中是坐在窑洞里的一位老者。这个大土洞真应了古人所说的“四壁皆空”，不过他还有草席、茶几以及造型颇精美的茶具，阳光由窗外照射进来，形成景物的光影反差，使得这窑洞内的简单景致，有了艺术的意境。

(宗 懋)



《老照片》预订邮购启事

《老照片》丛书的出版周期已趋稳定，分别于每年的三月、六月、九月、十二月出版。近来，经常有读者来电话来函反映在当地书店难以及时买到《老照片》。应广大读者的要求，《老照片》丛书从第11辑起办理预订邮购。

《老照片》1-10 每辑定价为 6.50 元，11 辑起每辑定价为 8.50 元，一次预订，最多 4 辑，可随时续订。汇款时请加付书价 10% 的邮资，并注明预订辑数。

同时，已经出版的各辑《老照片》及 1 至 3 辑合订本、4 至 6 辑合订本、7 至 9 辑合订本（定价均为 21.90 元），继续办理邮购。

社 址：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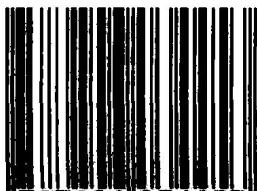
经办者：山东画报出版社发行部

邮 编：250001 电 话：(0531) 2906847

责任编辑 / 冯克力

装帧设计 / 蔡立国

ISBN 7-80603-445-5



9 787806 034453 >

ISBN 7-80603-445-5

K·107 定价：8.50元

目 录

谢 泳	从院士到学部委员	1
徐宗懋	胡适与蒋介石	11
罗点点	1959 年：夏日的旅程	25
宋海燕	毛泽东·丰产田·自留地	34
丰 克	1976 年“五一”节——北京的气候	37
史 建	20 世纪初的长江流域	45
常 言	大河在质问	53
华孟阳	舟楫与洋车	59
王焕理	仁川的中华楼	63
陈先农	新疆有过轮船	66
石 匠	葬俗改革的实录	72
雪 怀	苏州姑娘旧影中	75
秦 风	胡汉民还乡	82
吴小佩	鲁迅先生出殡的照片	84
迟阿鲁	“重庆”号巡洋舰在烟台	86
启 风	50 年前的金圆券风暴	92
山 民	谁之罪	101
丛乐天	追忆金门之战	104
崔港珠	道一声：祖父，对不起	113
华 锐	浙江女兵	116
夏立群	父亲的老相机	120
顾训中	为了忘却的记忆	128

老照片

曹 雷	父亲的梦	135
何 曼	八姐妹	140
柳 萌	播撒欢乐的人	149
李子旸	真的是在怀旧吗?	151
锐 明	“英雄”情结	153
沛 力	“思想阵地”与“国家学说”	155
汪稼明	新世纪之《老照片》	158

《老照片》丛书

总 编 辑

汪稼明

副总编辑

刘传喜

执行主编

冯克力

特约编辑

张 杰

姜 波

美术编辑

蔡立国

技术编辑

张 涛

法律顾问

张红霞

封二 19 世纪香港佳丽 (金伯宏) 插页 江西庐山鸟瞰·湖南长沙全景·杭州西湖鸟瞰 封三 窑洞里的冥想 (宗懋)

荡舟乞讨的母子 (秦雨 24) 来函照登 (乌丙安 57) “文革”中的合影 (张惠欣 71) 本辑封二照片的说明 (金伯宏 74) 寻欢的驻日美军 (林心 81) 战利品 (振峰 134)

征 稿

《老照片》是一种陆续出版的丛书，每年出版四辑。专门刊发有意思的老照片和相关的文章，观照百多年来人类的生存与发展。

对稿件的要求：所提供的照片须是 20 年以前拍摄的（翻拍件也可），且有一定的清晰度，一幅或若干幅照片介绍某个事件、某个人物、某种风物或某种时尚。文章围绕照片撰写，体裁不拘，字迹工整，传记、散文、随笔、考据、说明均可。

编辑部对投寄来的照片稿件，无论刊用与否，都精心保管并严格实行退稿。稿件一经刊用，即致稿酬。

来稿请寄：山东省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山东画报出版社《老照片》编辑部 邮 编：250001

电 话：(0531) 2060055 转 5407 2052472 (发行部)

邮购办法：请汇书款（每本书加付 1 元邮资）至上述地址，并注明所购书目。

·旧事重温·

从院士到学部委员

谢 泳

1949年以后，新时代和知识分子（特别是人文知识分子）的紧张关系就存在了。新时代从一开始就对人文知识分子存有成见，也许是早已意识到那些人文知识分子由于专业的关系，至少在思想上与新时代不和谐。所以我们分析这个时期知识分子的真实处境，应将从从事自然科学的知识分子和人文知识分子做适度的区别，因为在新时代，执政者对这两类知识分子实际是有他们自己的判断的。这个问题，我们可以从1948年中央研究院人文组院士和1955年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的变化中看出来。

1948年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共有81人，其中人文组28人，他们是：吴敬恒、金岳霖、汤用彤、冯友兰、余嘉锡、胡适、张元济、杨树达、柳诒徵、陈垣、陈寅恪、傅斯年、顾颉刚、李方桂、赵元任、李济、梁思永、郭沫若、董作宾、梁思成、王世杰、王宠惠、周鲠生、钱端升、萧公权、马寅初、陈达、陶孟和。

1955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共有61人，他们是丁声树、千家驹、于光远、尹达、王力、王亚南、王学文、向达、艾思奇、何其芳、吴玉章、吴晗、吕叔湘、吕振羽、李亚农、李达、李俨、杜国庠、沈志远、狄超白、周扬、季羨林、金岳霖、侯外庐、胡乔木、胡绳、范文澜、茅盾、夏鼐、马寅初、马叙伦、张如心、张稼夫、许涤新、郭大力、郭沫若、陈伯达、陈垣、陈寅恪、陈望道、陈翰笙、陶孟和、汤用彤、冯友兰、冯至、冯定、黄松龄、杨树达、杨献珍、刘大年、潘梓年、翦伯赞、邓拓、郑振铎、黎锦熙、钱俊瑞、骆耕漠、包尔汉、薛暮



1948年3月，中央研究院舉行成立20周年紀念會及第一次院士會議。圖為與會者合影，前排右四為胡適，左二為陳垣，左三為張元濟，二排左一為傅斯年，右四為馮友蘭，四排左四為李濟，五排左五為梁思成。（照片選自《圖片中國百年史》）

橋、魏建功、羅常培。

中央研究院士的選舉，據吳大猷回憶是這樣進行的：“三十五年由評議會籌辦院士選舉。先由各大學院校、專門學會、研究機構及學術界有資望人士，分科提名候選人，約四百餘人，三十六年由評議會審定候選人一百五十人。三十七年再由評議會選出院士八十一人。”（《中央研究院的回顧、現況及前瞻》，台灣《傳記文學》第四十八卷第五期，五十六頁）對於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選舉工作，我們今天可以做這樣的評價，即這是一次非常慎重的選舉，從人文組當選院士的名單上可以看出是以學術為唯一原則



1955年6月1日，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在北京举行，郭沫若致开幕词。

的选举，没有意识形态色彩，因为在这个当选的名单中没有国民党负责意识形态的主管人员（王世杰是以法学家身份当选的，虽然他曾做过国民党的宣传部长，但在当选院士时，他已离任改就外交部长一职），相反郭沫若却一直在这个名单上。胡适日记中曾留下了一份中央研究院院士人文组部分拟提名单（《胡适的日记》手稿本第十五册，台湾远流出版公司）：

哲 学：吴敬恒、汤用彤、金岳霖

中国文学：沈兼士、杨树达、傅增湘

史 学：张元济、陈垣、陈寅恪、傅斯年

语 言：赵元任、李方桂、罗常培

考古学及艺术史：董作宾、郭沫若、李济、梁思成

人文地理民族学：想不出人名

这个名单上没有胡适的名字，可见是有回避的，就是推荐人不能



波兰科学院副院长维尔茨基在大会上做学术报告。

自荐，在胡适提名的这些人选中，沈兼士、傅增湘最终就没有当选，而郭沫若却当选了，1948年郭沫若的政治态度是人所共知的，但中央研究院没有因为他的政治倾向就把他排斥在院士以外，所以大体可以说，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选举没有政治干预。1949年5月30日，竺可桢在上海见到陈毅，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到：“渠曾阅研究院院士录，见有郭沫若之名，知研究院之能兼收并蓄。”（《竺可桢日记》第二册第一二五七页，科学出版社）

中央研究院是国家的最高科学（包括人文）研究机构，一个时代的学术自由和政治宽容，可以说最能在这样体制化的行为中表现出来。对于一个时代政治文化的评价，要看它对于学者政治

选择的容忍程度，也就是说，一个时代在政治文化上的相对宽容，要看它的体制化行为，不能只看见它在执行体制化行为时具体的不宽容行为，更要看到它的体制化本身是不是一个能有宽容生长的机制，就 1948 年的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情况而言，我们应该对这个体制给出合乎历史事实的评价。除了郭沫若之外，还有马寅初，他的当选也是令人感慨的。在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选举中，马寅初也是 28 位人文组院士中的一位，而我们知道马寅初在 40 年代的政治选择和郭沫若是一致的，国民党软禁过马寅初，30 年代末期，他通过经济学家沈志远、许涤新和中共发生了联系，以后的马寅初就可以说完全是一个左倾的知识分子了。在 40 年代，他是在经济上批评国民党最激烈的一个经济学家，对国民党政权、对蒋介石、对四大家族和官僚资本，马寅初都写过很多文章。正因为如此，国民党才对他恨之入骨。他也是 1948 年秋由中共接到香港然后到了解放区的民主人士之一。前几年，我看过一本《马寅初抨官僚资本》（重庆出版社出版，周永林、张廷钰编），其中所收的文章都在 1948 年以前，是在他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之前写的，也就是说，他的那些抨击官僚资本的文章并没有影响了他的当选。中央研究院在人文组候选人的评语中对他的介绍是：“研究中国金融市场及财政金融等问题”。（李扬编《国立中央研究院史》第一四三页）当时人文组的院士候选人共有 55 人，最后当选的只有 28 人，是两个人当中才能选一个，那次选举原计划选出 100 人，但最后当选的只有 81 人。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，我把人文组 55 名候选人的名单抄在下面（下划线为当选者）：

吴敬恒、金岳霖、陈康、汤用彤、冯友兰、余嘉锡、胡适、唐兰、张元济、杨树达、刘文典、李剑农、柳诒徵、徐中舒、徐炳昶、陈垣、陈寅恪、陈受颐、傅斯年、蒋廷黻、顾颉刚、王力、李方桂、赵元任、罗常培、李济、梁思永、郭沫若、董作



投票选举学部常务委员会。

宾、梁思成、徐鸿宝、王世杰、王宠惠、吴经熊、李浩培、郭云观、燕树棠、周鲠生、张忠绂、张奚若、钱端升、萧公权、方显廷、何廉、巫宝三、马寅初、陈总、杨西孟、杨端六、刘大钧、吴景超、凌纯声、陈达、陶孟和、潘光旦。

从上面这个名单中可以看出，这 55 人当中多数是主张走中间道路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，在国民政府中做过官的人也不在少数，像蒋廷黻、吴景超、何廉等，都没有当选。在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选举中，胡适和傅斯年是关键人物，但我们从这个名单中可以看出和胡适、傅斯年关系很好的学者当中没有当选的也很多，如张忠绂，他是胡适做驻美大使时身边的两个助手之一（另一个是钱端升），还有潘光旦也没有当选。

对于这次院士的选举，夏鼐在当时就说过：“这次中央研究院举行第一次院士会议，可算是近年来国内文化界的一件大事。



大会通过《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关于建议依法严惩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决议》，使得学部成立大会的政治色彩更趋浓厚。

中央研究院创办已达 20 年，今年才举行选举院士；原拟选出 80 名至 100 名，听说选举时第一次投票仅选出 60 来名。一连投了五次票，才选足 81 名，可以说相当的郑重审慎。不管各方面对于这次院士名单的意见如何（尤其因为提名的办法不佳，有些可以当选的学者，根本没有被提名，以致无从选出，令人颇有遗珠之感），我们如果说‘这一个名单，相当的足以代表今日中国学术界的情况’。这话大致不会有多大的错误吧。”（《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的分析》，《观察》周刊，第五卷第十四期第三页）

1955 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的产生则是另外一种方式，据当时负责学部筹备工作并担任社会科学领域学术秘

书的刘大年回忆：“第一届学部委员的产生属于协商性质，是协商产生的。自然科学方面的人选是科学家推荐，但推荐不是选举。”“社会科学方面是在提出名单之前，征求了各学科主要人物的意见。我当时参加了这些活动，主要在北京地区找有关人士谈。北京以外的就没有去找，是书面征求意见的。我记得当时找了这样几方面的人：哲学方面有杨献珍、艾思奇、张如心、汤用彤；语言学方面有王力、罗常培、丁声树、吕叔湘；历史学方面有季羨林；经济学方面有狄超白，等等。当然不止这几位，还有一些我现在记不清了。在征求意见时，我们首先把科学院的精神告诉他们。当时提出的人选标准主要有这么两条：一条是政治的标准。社会科学的政治标准主要是拥护社会主义，拥护共产党。另一条是学术标准，即在本学科中是否有成绩。所谓成绩就是看他的著作，以及群众对他学术著作的评价。根据这个要求，来征求他们认为适合做学部委员的人选来。然后，党组根据这些意见拟出名单。”（刘澍《刘大年忆郭沫若》，《百年潮》一九九八年第四期第六十一页）结合刘大年的回忆，我们现在可以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的学部委员名单做一个简单的分析，从中看一看一个时代的政治文化是如何介入学术的。在自然科学的学部委员中，过去中央研究院的院士，凡是没有离开的，都成了后来的学部委员，但是也有一个例外，就是少了生物学家胡先骕，原因是胡先生一直是坚定的自由主义者，加上他在 50 年代坚决反对李森科那一套，虽然他的专业是生物学，但新时代在这一点上是毫无余地的，所以尽管胡先生是中国现代生物学的主要代表，但他还是没有能进入学部委员中。在离开的 24 名院士（赴美、赴台）中，有 10 人是人文组的院士，也就是说，在 28 名人文组的院士中差不多有三分之一强的人离开了，或者说，当年离开的院士主要是人文组的院士。比较一下就会发现，中央研究院和中国科学院学部在组成的理念上是完全不同的，中央研究院是以美国模式组成

的，而中国科学院学部是以苏联模式组成的。这一点在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上通过的总决议中说得很明白，就是要“进一步学习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先进科学”（《一九五六年人民手册》第五七二页，大公报社）。出席学部成立大会的就有苏联科学院副院长巴尔金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和波兰科学院副院长维尔茨皮斯基。这是一个政治笼罩一切的时代，科学也未能幸免，其实那时先进的科学并不在苏联和其它人民民主国家。中央研究院人文组的院士是28人，过了7年时间，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学学部委员就成了61人，是过去的近三倍，学术并没有发展，而学部委员的人数却在激增，但仔细观察一下，我们就会发现，这个学部委员名单中除了人数的增加以外，更重要的是强化了人文学科的意识形态色彩。过去，中央研究院人文组院士的构成中，除了顾及各学科的专业水平以外，一个明显的特点是法学家在人文组院士中有较大比例，有王世杰、王宠惠、周鲠生、钱端升四位院士。到了学部委员时，这四位法学家中，除了二王去了台湾外，留下来的周鲠生和钱端升都没有成为学部委员，而社会学家中也将陈达先生去掉了。1955年学部成立距批判胡适运动不到半年时间，过去和胡适关系较近的学者就没有能再成为学部委员，最典型的是顾颉刚，作为一个研究古史的学者，他的专业与政治并不紧密，但因为他过去和胡适的关系，再加上在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尹达个人的关系不好，自然就被排斥在外了，他在日记中说：“近来批判胡适历史学、考据学的文字中，常常牵到我和《古史辨》，因此，我在今天会上说个明白。”（顾潮《顾颉刚年谱》第三五五页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）因为顾颉刚在批判胡适的考据学时，曾说了几句公道话，他说考据学是反封建的，“闻者大哗，对于抨击”。

在留下来的中央研究院院士中，没有成为学部委员的也主要是人文组的院士，如张元济、柳诒徵、余嘉锡（1955年逝世）、